



# 钱锺书捉刀替父写序



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皆以国学造诣精深、学术成果斐然而著称于世。父亲钱基博(字子泉),是著名的古文学家,学贯古今,文史兼治,有“集部之学,海内罕对”的美誉。清末状元张謇盛赞其文章“大江以北,未见其伦”,国学大师钱穆说自己“同事逾百人,最敬事者,首推子泉。生平相交,治学之勤,待人之厚,亦首推子泉”。儿子钱锺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才华横溢,学贯中西,被誉为“博学鸿儒”“文化昆仑”,有“中国古典文化里最后一个风雅之士”的美称。国学大师吴宓曾作诗句“才情学识谁兼具,新旧中西子竟通”,对自己的学生推崇有加。

■ 周惠斌 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

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

钱锺书家学渊源,古文根底深厚,15岁时已通览《古文辞类纂》《骈体文钞》《十八家诗钞》,读书之余,乐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,由口授进而代写、代做文章。在无锡辅仁高中读书期间,钱锺书曾披挂上阵,替父做“枪手”,为乡下一大户人家撰写墓志铭,洋洋洒洒,文采飞扬,钱基博展读之下称誉不已。此后,街坊四邻竞相上门请他代写书信或文章,钱锺书总是来者不拒,欣然完稿。

1930年,在史学家吕思勉的介绍、推荐下,商务印书馆拟出版钱穆的著作《国学概论》。《国学概论》是钱穆在1925年至1928年间,执教无锡三师、苏州中学两校时为学生编写的授课讲义。上世纪50年代末,钱穆在《新版附识》中曾自述:“此稿成于三十年前,迄今回视,殆所谓粗识大体,未为精微者也。”时年37岁的钱穆,特地请久负盛名、年长他8岁的同宗叔父钱基博作序。钱锺书听说后毛遂自荐,游说父亲,表示自己愿捉刀写序,钱基博大度地允诺同意。

钱锺书不日就写完了序,落款“宗人基博谨序。十九年七月”。钱基博审阅后,觉得整篇序言1300许字,言辞肯綮,有板有眼,如“第九章竟体精审,然称说黄黎洲、顾亭林、王船山、颜元斋而不及毛奇龄,是叙清学之始,未为周匝也。殿以黄元

同、俞荫甫、孙仲容而不及陈澧,是述清学之终,未为具尽也”,评析精当,如同己出。文末“……宾四(注:钱穆的字)论学与余合者固多,而大端违异,其勇于献疑发难,耳后生风,鼻头出火,直是伯才”句,尽管锐气有余,厚重不足,但亦无懈可击。于是一字不改,签上自己的大名直接交稿完事。钱穆后来也一字不改,将该序送交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。虽然他在“自序”中称钱基博的序“有所针砭”,但还是向“子泉宗老”致以特别鸣谢。

《国学概论》出版后,谁也没有想到,这篇观点鲜明、笔法老到的序言,竟然出自刚入清华大学,年仅20岁的青年学子钱锺书之手。只是上世纪80年代,台北联经出版社推出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时,收录的《国学概论》中,钱穆先生已然删去当年“钱基博”所作的序,连带“自序”中申谢“子泉宗老”的字句,也一并删掉。不过,同样为“全集”收录的《师友杂忆》中,钱穆早年所写的“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,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,而兼通中西文学,博极群书,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”等语句,却依旧赫然在目。

曾任民国北洋时期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,当年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赠送给钱基博,钱锺书又代父作诗《谢章行严先生书赠横披》酬答:“活国吾犹仰,探囊智有馀。名家坚白论,能事硬黄书。传市方成虎,临渊尚羡鱼。未应闲此手,磨墨墨磨渠。”1994年,钱锺书出版《槐聚诗存》时,在序中写道:“代人捉刀,亦复时有。此类先后篇什,概从削弃。”但这首诗不仅保留了下来,他还在“题后”特别注明“代家君”三字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钱基博在论著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及相关文章中,对范伯子(1854—1905年,江苏南通人,范仲淹26代孙,清末诗文名家)的诗作先扬后抑、由褒至贬:“少(年轻时)出语惊長老,壮而益奇……工力甚深,下语不肯犹人,峻峭与三立同”,“议论未能茂畅,叙事亦无神采,独以瘦硬之笔,作呻吟之语”。前后评价判若两人,引起南通一带的文人强烈不满,纷纷著文指责他评论不当。钱锺书得悉后,接过父亲的笔杆,参与到论战之中,书生意气,甚至暗讽范伯子曾担任李鸿章的幕僚,是“穷断脊梁”,批驳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## 胡适与刘文典的友谊

1921年,北京大学成立了研究国学的机构,胡适拟出一个计划,想把有价值的古代文化典籍整理出来,既继承传统又古为今用,且每一种书要成为可读的单行本。胡适让刘文典负责整理《诸子文粹》和《论衡》两部书。后来胡适又筹资创办了《国学季刊》,成立了编委会,特地邀请刘文典担任该刊编辑。

刘文典潜心研究,终于完成了《淮南鸿烈集解》。这是刘文典第一部研究古籍的书。他很看重,便请胡适为书作序。他特别向胡适提出,要求用文言文而不是白话文写。作为白话文的倡导者,这让胡适很是为难。经过慎重思考,胡适还是答应了刘文典的请求,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漂亮的序。

序文一出,立刻引起一场风波。支持白话文和反对白话文的人纷纷猜测,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,胡适是不是要偃旗息鼓了?但正是胡适用文言文作序的《淮南鸿烈集解》的出版,刘文典得到学术界的公认,从而确立了他在国学方面的地位。

此举更显现出胡适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的谦逊与襟怀。作为一生倡导自由主义的胡适,他看中的是刘文典身上那股精神自由刚正不阿的个性。胡适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旅程,使他渴望对话,渴望开诚布公,渴望肝胆相照,渴望人人选择个人的人生方向,渴望文人学者有自由精神的个性。这正是刘文典能成为胡适知音的原因。

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被投入监狱后,胡适为营救刘文典可谓全力以赴。刘文典出狱后走投无路时,胡适又找到蔡元培,力邀刘文典回北京大学任教。这一切,正是因为胡适与刘文典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,他们虽然性格迥异,却能成为挚友。

■ 沈治鹏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蔡元培给校工涨工资

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,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。他主政北大期间,求贤若渴,向全国聘请一流学者任教授与讲师。一时间,辜鸿铭、胡适、陈独秀、梁漱溟、周作人、刘半农等都来到了北大,北大可谓大师云集,人才济济。

一段时间后,蔡元培发现,北大作为中国的一流大学,学生众多,仅有大师是不够的,还需要背后默默奉献的校工,后勤补给这块的任务特别繁重。

清晨,校园的第一声钟由一个校工敲响。只要是上学期间,无论刮风下雨,敲钟的校工准时到岗。每天如此,从来没有缺席过。冬天天气特别寒冷,学校需要烧煤取暖。烧煤的校工早起晚睡,保证按时供暖。学校的电工,他们不仅在学校维修,教授家里的电灯、电话出了问题也找他们。还有那些打扫卫生的校工,他们每天往往是披星戴月……

在北大,最辛苦的人就是这些校工。教授的课再多,也上不了一整天,也就两三节课,上完课后就没什么事情了。相比之下,教授轻松很多,但教授的工资比校工高出许多。

蔡元培要让普通劳动者——校工也要活得有尊严、有奔头、有希望。所以他决定给校工涨工资。消息传出,在北大校园惹起了争议,有些教授认为校工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,应该拿低工资。蔡元培力排众议,他说:“虽然校工没有文化,但他们投入了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时间成本。北大光有大师是不够的,还有背后默默奉献的这些校工,我们应该记住他们。”

工资涨了后,校工的积极性提高了,工作热情特别高。另外,蔡元培每次迈进学校大门,他都会摘下礼帽,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致敬。

社会分工不同,职业无高低贵贱,任何劳动者都应该受到尊重。蔡元培给校工涨工资、向校工摘下礼帽鞠躬致敬,体现了他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。

■ 张雨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